

# 紀念戴傳賢先生

袁同疇

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先生對我說：「戴傳賢季陶先生逝世三十週年了，在此赤燄彌漫，舉世滔滔之時，對此反共理論大師，益增景仰，你可以寫一篇文章來紀念他嗎？」我因為眼睛有白內障，很久沒有寫作，但鑒于王先生的熱誠，又目觀世局如此混亂，很自然的勾起了我對戴先生的回憶，而有無限的感觸。

## 定計決疑特立獨行

戴先生是一位智慧絕倫，而又有特性的人，他常常不同流俗，獨來獨往，好像天上的一顆彗星，有時無影無踪，有時又出來大放光芒。他生平的事蹟，除年廿參加革命，才華英發，以及嗣後歷任樞要，對中央的定計決策多所貢獻諸大端，久為世人耳熟能詳，無待贅述外，茲就其平日的特立獨行，捫拾數點如下：

(一)當西安事變，中央定計討伐叛逆之時，有某大員來問戴先生，萬一蔣先生遇害，吾等予心何安，戴先生毅然說：「你放心！我和蔣先生的關係并不比你們輕呀，我主張下令討伐，正是所以救蔣先生呀！革命是以身許國，就令蔣先生萬

一不幸，也是求仁得仁，有何不可？」某大員無言而退，後來蔣先生果然平安脫險。

(二)戴先生雖久居高位，但不願干預黨政機關的人事，如有人要他介紹求職或升遷，他都婉謝，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身為考試院長，考試及格人員需要分級各機關服務，如果又以八行書干涉人事，不是自己給自己过不去嗎？再則居高位的人，應該一秉至公，愛人以德，不可以私恩示人，以免形成派系，而貽害國家，歷史上因派系傾軋，而禍國殃民的往事，他常引為深戒。

(三)他不喜歡無謂應酬，對於婚喪喜慶，也看的非常慎重，從不輕易參與。為人證婚更非所願，他的意思，現在一般的結婚儀式，既不合我國的傳統，也沒有禮範根據，所以他只好拒絕。上海某大聞人，家祠落成，全國顯要以至各界領袖都送賀詞頌揚，而戴先生獨缺如，此雖小事，更可見其風骨，亦可知其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一斑。

(四)民國初年大家都公認我國開國元勳是孫中山先生和黃克強先生，所以并稱孫黃，後因黃先生早逝，黨內又有若干變化，漸漸大家很少提到黃先生了，民國十五年本黨（中國國民黨下同）

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內掛滿了革命先烈遺像，而獨不見黃先生的，我有點奇怪，後因事到後台接洽，才發現黃先生的照片放在後台的牆腳下，是有意不掛出去的，黨內如此冷落這位豐功偉烈的元勳，我實在有點不平，一直納罕多年。民國廿六年抗日戰起，政府遷川，戴先生要我先去湖南等他。他說：我國有兩位開國元勳，一位是孫先生，一位是黃先生，孫先生的家鄉廣東他是常去的，而黃先生的家鄉湖南，他還沒有去過，所以這次入川，要取道江西轉湖南，藉以瞻仰黃先生的家鄉，而了夙願，我聽了他這幾句話，一時無限酸痛又無限安慰，總算是世間還有公道呀！

(五)胡展望先生輔助國父獻身革命，始終不渝。國父逝世後又能團結同志，穩定中樞，完成北伐統一大業，其對國家貢獻之巨及其高風亮節，均為世所共仰，後因政見與中樞失和，戴先生函電斡旋，費盡苦心，民國二十四年胡先生去世，首都開會追悼，各方挽詞很多，類皆泛泛之詞，戴先生授意陳伯稼先生代寫挽聯云：「立大節而不可搖，定羣疑而不可惑，操危慮深，共仰良工心

獨苦；尊德性則為明師，道問學則為益友，生離死別，愴懷令我淚偏多」語意何等切直，何等沉痛；然非戴先生何能如此。其中立大節定羣疑二語，胡先生固可當之無愧，其實戴先生又何曾不如此呢？

### 三篇文章憶述往事

我對戴先生的言論思想的記述和評論，在他逝世後曾撰三篇文章：第一篇「憶孝園戴先生」，第二篇「一個亟應辨正的史實」，第三篇「為一個亟應辨正的史實再說幾句話」。這些文章先後印刷發表時，因為發行不廣，恐怕有很多人還沒有看到，謹就原稿重加整理增訂附刊於後，敬請中外雜誌廣大讀者指教。

## (壹) 憶孝園戴先生

### 學術淵深筆力敏銳

戴先生明哲天生，睿智絕倫，其在辛亥革命時期，戴天仇三字固已馳聞遐邇，即余拜識先生之學術思想亦遠在民國九年以前，時方新文化運動勃起，戴先生以新穎敏活之筆，談政治經濟諸問題，所作散見於當時在滬出版之星期評論及總理所辦之建設雜誌諸刊物中，每文一出，無不膾炙人口，與當時在北京領導文革之胡適之先生遙相輝映，堪稱南北媲美。國民黨在此時代之大轉變中，仍不失其領導地位，固由於總理先知先覺大道大德之所致，而戴先生不斷輸入新血液

，實亦助與極大之活力也。

民國十三年春，余因在南洋辦報，鼓吹民族革命，為英政府所忌，被逐回國，至廣州，適當國民黨改組之後，氣象一新，諸友勸余入黨，余曰：「余在海外數年，目擊僑胞受外人壓迫，深感欲求個體解放，必先求國家民族之解放，此與國民黨之見解相同，而與共產黨之主張相異，今國共合作，余將安適乎？須俟與戴季陶先生詳談後，方能決定入黨與否」。旋晤戴先生于廖仲愷先生家，時值暮春，嶺南早熱，葵影蘭香，清幽盈室，戴先生於春風滿面之中，解答余所提諸問題，並指案頭所置正在整理之總理三民主義講演稿謂余曰：「孫先生刻正講演三民主義，不久即可全部問世，君細讀即知為今日中國革命之唯一寶典矣，共產黨之主張固有不同，但既加入本黨，即應遵守本黨之政綱黨綱。在此國民革命之洪流中，吾人必須步調一致，方能發揮最大力量。君入黨與否，此時不必相強，刻本黨正籌辦黃埔軍校，請先隨余至軍校政治部工作，俟對本黨確具信心時，再行入黨可也」。五月廿八日余至軍校，司編撰之事，總理講演之三民主義亦相繼出版，每與戴、廖（仲愷）兩先生晤及，均津津為余闡釋內容，民國十三年七月一日遂由戴、廖兩先生介紹入黨。此為余獻身本黨之始，數十年來于本黨主義始終信守不渝，實戴先生之所賜也。

### 西安事變討逆卓見

戴先生對於本黨總裁 蔣公交誼最厚，親如

手足，而敬若兄長，總理逝世後，戴先生即以其事 總理者事之，舉凡黨國大計，革命理論靡不互相研討，彼此參證，說者皆謂 蔣公思想與戴先生如出一轍，蓋皆淵源於我國固有文化而以公忠體國之精神以出之也。民國廿五年冬 蔣公蒙難西安，訊至都門，戴先生義憤填膺，怒不可遏。余趨詢計將安出，公毅然曰：「無他，討賊可耳，蔣先生以身許國，何懼賊之劫持耶！」囑即草「西安事變與討逆」一文送中央日報發表，旋中央集會于大禮堂，主席居覺生先生言至中央定計討賊時，戴先生奮臂大呼，聲震屋瓦，聞者無不感奮，計定大軍入陝，張學良等因受 蔣公偉大人格之感召，恭送 蔣公返京，軒然大波，于此解決，羣情歡慰，咸服中樞決策與 蔣公精神得相融合。倘當時中樞無人主持，或主持之者而無戴先生與 蔣公交誼之厚，相知之深，亦何敢毅然作此決策，則局勢演變，或仍不堪設想。後 蔣公於其「西安半月記」中，亦言因聞中央飛機飛臨西安，即知中樞定計有人，中心寬慰云云。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其 蔣戴兩公之謂乎！余於此至服戴公之胆識，更見 蔣公之偉大也。

### 明於料敵嚴於斥偽

談革命理論不難，而精確匪易，反共抗俄之人士固多，而一貫可貴，戴先生以超人之智慧，堅定之立場，精確之理論，以從事於反共抗俄者二十餘年矣，從無一日稍易其立場，稍懈其職責。盧溝橋事變之日，適廬山暑期集訓之時，余隨

戴先生寓於廬山蘆林，余聞大戰既啓勝負誰屬，先生曰：「日本徒足爲中國之仇，而非中國之敵也」。後日本覆敗，而赤俄佔我東北，其言果驗。政治協商會議在渝召開，共匪大展其和平攻勢，外詐友幫，內欺國人，先生憂鬱特甚，慨然歎曰：「共黨之亂爲人類歷史上空前浩劫，吾國經此劫後，人口之減少將以幾成計，而非以百分比計也」。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大陸同胞受害之慘，殺戮之衆，非曠古未有乎？先生常能見微而知著，目光宏遠，而立論精微，其高妙處每多人所難解。余承教多年，偶聞其言，亦常不解，日久忽又驗之，至今先生所言而未解者尚多，况驟聽者乎！故余嘗謂人曰：「戴先生所言高深，不可輕議其非，吾人與其謂爲不好，無寧謂爲不愜也」。先生對首鼠兩端之跨黨份子常深惡痛絕，謂邵力子爲陰謀家。張治中原出入其門，後以奔走於國共之間，自詡爲進步人物，先生曾面斥其妄，不稍寬假，世或以爲太過。卅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 蔣公由京引退飛浙，余適以事至機場，聞訊惶惑，見機場送行諸人皆面露憂色，獨邵力子與張治中兩人對奕于機場之休息室以取樂，大有不勝快意之感，司馬之心，昭然若揭，後邵張果藉和談飛平附逆。嗟乎！兩人之受國恩厚矣，今反藉爲投匪之資，其心尙堪問耶！余于痛憤之餘，更不禁三復戴先生之言矣。

### 以佛家心行聖賢教

戴先生以現代之思想，而篤信佛教，世或以此爲先生病，殊不知此未足以病先生也。先生信

佛，原于天性，亦卽世所謂有宿根者，非僞也。先生向主宗教信仰自由，從不强同於人，亦不求人之強同於己，民國廿六年余與考試院同事數人隨昭匡廬，先生遍禮諸寺，莫不虔誠跪拜，同事中或有應否隨同頂禮相商者，余曰：「吾于佛教未具信仰，不能自欺其心也」。先生聞之，亦釋然。先生於寓中固常設壇誦經，然從不邀同事禮佛，卽談佛亦少，外所傳「考試院叮叮噹噹」者蓋誦謗之詞耳。戴先生以信佛之故，其思想自亦受其影響，憶昔曾與余論蘇東坡之政治思想，謂東坡以絕世之才，而宦途坎坷，惟能以佛家之心，行聖賢之教，故所至皆澤被生民，稱頌後世，並舉佛語與東坡之言行相印證，後余曾爲「寧遠樓上一席話」一文以紀其事，民國廿三年刊于南京中央日報，中關佛學一段，爲戴先生所親填，惜稿已無存，要而言之，無非以大慈大悲之心，行至剛至正之事，其入世也爲偉大之政治家，其出世也爲偉大之宗教家。自今而思之，實亦先生之所自況也。嗚呼！人世滄桑，瞬息萬變，昔以論東坡者，今以論先生，先生其以爲當乎，否乎？

### (貳) 一個亟應辨正的史實

#### 西山會議當年誤會

關於戴先生參加發起共黨的傳說，最初是來自西山會議。西山會議是本黨諸位老幹部同志于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在北平西山召開的，目的在反對本黨改組以後，共黨份子竊黨權，危害黨國

。他們因爲戴先生以前曾贊同本黨改組，又曾對社會主義有研究，也許同時還受了共黨份子從中造謠，分化本黨同志的影響，竟誤認戴先生曾參加發起共黨，而不准他與會，使其遭受毆辱而去。其實戴先生雖曾贊同本黨改組，並不贊成共黨份子以跨黨方式加入本黨，更反對他們以偷天換日的手法，曲解本黨的主義和政策，目的原和諸位老幹部同志一樣。他對社會主義有研究，不能說他就是對共產主義有信仰。而且相反的，惟其他有深遠的研究，才瞭解共產主義的惡毒，而反對得更徹底。他遠在本黨改組以後，西山會議以前，就和共黨在宣傳和組織各方面直接衝突。民國十四年，總理逝世以後，他更不顧任何艱險，高舉孫文主義的義旗，指出國共思想的區別，使本黨同志知所取舍，而團結一致，免受共黨的分化利用。十四年五月他在廣州出席本黨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搭船回上海，我因事由廣州往汕頭，恰好在船上和他相遇。他和沈定一（文虛）先生同住一個房間，我們談了許多有關國共思想不同，政策各異的問題。我到汕頭上岸後，曾寫了一篇「往汕頭去」的文章，敘述我們在船上談論的情形，寄給戴先生。他毫不顧慮的送交上海民國日報發表。我回到廣州，共黨份子對我大施攻擊，說戴先生背着孫總理的牌位入聖廟，我又背着戴先生的牌位入聖廟，冷嘲熱罵，嗷嗷不休。好在十四年六七月間戴先生兩本反共名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相繼出版，本黨同志奉爲圭臬，共黨陰謀遂受慘重打擊，終於奠定了本黨日後清黨的基礎

。像這樣一位傑出而偉大的反共先知先覺，反說他會參加發起共黨，不准他參與反共集會，這不是是非顛倒，認友為敵嗎？除了共黨在旁邊稱心快意，竊笑大家中計而外，別無話說。

### 周陳兩人說法矛盾

說戴先生曾參加發起共黨的是周佛海和陳公博，這兩個人都是無聊無恥的投機份子，時而共產黨，時而國民黨，最後竟以漢奸下場。他們說話，原不可靠，且極矛盾。周佛海說，他於民國九年暑假從日本回到上海，和陳獨秀他們商組共產黨，戴先生也曾參加，並為起草黨綱。陳公博則說，中共成立，戴先生雖然沒有參加，但很同情，那時他正在辦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所得盈餘，來幫助共產黨的黨費云云。周佛海所說這些，固已指明是在民國九年，陳公博所說的雖然沒有指明那一年，但戴先生創辦交易所是在民國九年，到民國十年就結束了。那末他們兩人所說的應該都是民國九年的事，而中共是民國十年七月才成立的。反過來說，民國九年根本還沒有共產黨，戴先生又何從而參加，而同情呢？周陳兩人所說的話顯然就有疑問了。戴先生參加發起共黨的傳說是一個誤會，這個誤會是這樣來的：民國九年陳獨秀在上海曾以廣義的社會主義相號召，籌組社會主義青年團，因為戴先生是全國聞名的學者，而且對社會主義有研究，對勞工問題也注意，陳獨秀很自然的會和他交往，爭取他的支持。戴先生也許對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參加了一點意見，或竟同意贊助，不過他的思想比較穩

健，且不願背棄本國傳統文化，這一點就和陳獨秀有很大的距離，所以他的態度還是很保留的，在任何集會中都沒有他的踪跡。周陳兩人所說的，或即指此一段關係而言。至於後來的共產黨，和他的主張根本冰炭不相容，他反對惟恐不及，還談得上參加或贊助嗎？

### 我親知社青團真相

談到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我身歷其境的事。民國九年，我正在上海求學，並常在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和時事新報「學燈」欄寫為文章，鼓吹社會改革運動。當時正在五四運動之後，新思潮勃起，大家都有改造舊社會的共同願望，所以常和邵力子、沈玄廬、張東蓀、陳獨秀他們會面。陳獨秀因有由思想而行動的野心，對於青年更加拉攏，所以和他見面的時候更多。我和他原本不相識，那時我和兩個以前在中學時期的同學，在貝勒路吳興里，合租一個前樓居住。這兩個同學，一個名叫羅覺，（即後來在上海名諱一時，因搞工運而被殺的羅亦農。）一個名叫袁篤實，（後曾留俄，參加共黨，嗣又脫離共黨，抗戰時我在重慶還遇見他，滿口反共言論，以後情形就不知道。）他們兩人原擬留法，因為勤工儉學停辦，滯留上海，另候出國機會。他們夜間就在同里的救國日報館擔任臨時校對工作，賺些生活費用。那時上海的包飯很便宜，每日送來兩餐，普通一人一月只要大洋六元。我們吃包飯久了，也有點膩人，一個春天的上午，我們到救國日報館借印刷工人的煤油爐燒點菜吃，那時的煤

油爐還是用棉線做火心的，點起火來，滿屋都是油煙，正當烏烟瘴氣的時候，忽然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外面下着小雨，一位頭戴雨帽，身穿雨衣的紳士遞給我一張名片，並說是來看我的。我看名片，赫然是陳獨秀三字，請他進屋，屋內只有長板凳幾張，就坐後，他說常在報上看見我的文章，所以來和我談談。相談沒有多久，他就辭出，臨行留下他的地址，要我們常去和他談談，從此我們就常見面了。大約過了兩三個月，他邀我們共同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即SY）。那時我正在組織滬濱工讀互助團，團內有同學八人，（後來留俄回國，曾任鮑羅廷秘書，為共黨重要人物，繼又脫離共黨的卜道明也是其中一人。他原名卜士疇，也是我中學時期的同學。）我們就集體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會是在老漁陽里二號陳獨秀家裏開的，與會的除陳獨秀和我們幾個同學而外，還有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李達、俞秀松等人。以後在新漁陽里租了一幢房子作為團址，外面掛着外國語學社的招牌，專門傳授俄文。（由山東人楊明齋主持，楊並辦了一個中俄通訊社，傳播赤化新聞。）

### 社青共青是兩回事

社會主義青年團原以研究各種社會主義為宗旨，所以大家樂意參加。我們常常開會討論，對於舊社會必須改革，可說全無異議，但是新社會如何建立，採取何種型態，則各有各的意見。當時社會主義的宗派很多，有激烈的共產主義，有溫和的社會政策，有理想的烏托邦，也有虛無的無

政府主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吳稚暉敬恆先生也常來這裏走走，我曾見他穿着一件破馬褂在外國語學社講演，但我從來未遇見戴季陶先生。戴先生的文名我是很景仰的，可是我在上海總沒有見過他。有人說他原也住在新漁陽里，後來搬回湖州去了。有一次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外國語學社開會，爲了一件小事，我和陳獨秀爭論得很厲害，就是因爲沈雁冰（即茅盾）譯了一部書賣給商務印書館，得版酬八十元，他捐贈給外國語學社，購買參考書。我主張各種社會主義的書只要有賣的都可以買，陳獨秀堅決反對，他說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把其他的書買來，反而把大家的思想攪亂了。我說如果不把各種社會主義加以研究比較，又怎能知道那個好那個壞呢？要大家盲從是不行的。因此一逼，陳獨秀就宣布停止討論，要我夜間到他家裏再談。是夜我到他家裏，他就乾脆告訴我，他已決定把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組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問我和我的同學贊成與否，如不贊成，就各做各的好了，從此我們退出社會主義青年團，而他就把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組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即CY），後來又正式改爲共產黨（即CP）。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時期辦的刊物名叫「勞動界」，由我主編。後來共產黨辦的刊物名叫「響導」，兩者言論主張，截然不同。這些事當時都是祕密的，所以外間很難弄得清楚。要而言之，共產黨雖是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演變而來的，但是前後的主張各異，參加的人員也不盡同，不能視爲一體。比如某甲生了幾個兒子，又生了幾個孫

子，他的兒子他的孫子固然是由某甲而來，但不能說他的兒子他的孫子就是某甲。所以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共產黨是共產黨。如果把共產黨當作社會主義青年團，就無異把某甲的兒子孫子當作某甲一樣的錯誤。這是一段我所親見的史實，可是知道的人很少，我有生之日，不可不予辨正。

### 社會主義並非共產

我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期間，可能也就是周佛海所說他于民國九年暑假從日本回到上海的期間，但是我沒有遇見過他，也許因爲他在上海的時間很短，否則就是陳獨秀不願團員彼此連繫，而有礙他的個人統治。毛澤東原在北方會來上海一次，住在哈同花園附近的新民三里，睡地板，室內只有一張桌子供寫作。我們原在湖南學生會認識，並共同參加驅毒（督軍張敬堯）運動，在上海也見過幾次面，但彼此談不來。他爲人陰沉，醉心共產主義，堅信馬列教條。而我則以爲中國社會固需改革，但不能走共產主義路線。因爲我國產業落後，根本沒有真正的資產階級，也沒有農奴制度，實行共產主義，等于無的放矢。再則共產主義不能激發人類工作的努力，必使生產萎縮，強迫勞動，又會造成殘暴統治的惡果。我所組織的滬濱互助團，原想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結果各取所需做到了，各盡所能沒有做到，所以沒有多久就結束了。我有這個痛苦經驗，更加速我和陳獨秀他們的距離，這也是我退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原因。以戴先生學識的淵博

精深，當更瞭然于共產那說之爲害人羣，且不適合我國國情，而避之若浼了。

根據上面所述事實，並依時間推測，周陳兩人所說戴先生曾參加發起的，可能是指社會主義青年團，而絕對不是共產黨。不過前面我已說過，在陳獨秀的心目中，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常把社會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共產黨連繫在一起，以壯聲勢而自欺欺人。這是共產黨質變的手法，不但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如此，對其他團體也莫不如此。周陳諸人惑於他的浮言，固易以訛傳訛，把社會主義青年團當作共產黨，把戴先生可能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了一點意見，也就當作參加了共產黨。而外人不知，更易中他們造謠中傷，挑撥離間的毒計，也跟着說，戴先生曾參加發起共產黨，並爲起草黨綱，籌助黨費，三人成虎，衆口鑠金，竟釀成西山會議時的不愉快事件，並于其身故之後，仍被褻污，致使佛頭著糞，未免太冤枉，太殘忍了！

### （參）爲一個亟應辨正的史

#### 實再說幾句話

關於戴季陶先生曾參加發起中國共產黨的傳說，散見各種書刊，多係輾轉引述，以訛傳訛。窮源究本，最初還是共產黨以口頭傳播出來的，意在分化本黨同志。果然，他們這一手，在本黨內外，造成了若干錯覺。戴先生在西山會議被毆的一幕，即其明證。嗣後以文字傳述的，第一是

周佛海和陳公博，其次是張國燾和包惠僧。他們都是中共的創始人，他們所說的，無論其可靠程度如何，都是這一傳說的原始資料。現在把它分別摘錄于後，以供研究探討。

### 周佛海陳公博憶述

周佛海是于民國九年暑假由日本回到上海，參與籌組共黨，他後來追述當時的情形說：「……到了上海……去時事新報館訪張東蓀……：張東蓀告訴我，陳仲甫（獨秀）要見我……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海陽里二號訪仲甫，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人吳廷斯基在座。吳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大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爲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太多，實際行動一點也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是贊成的。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大劍）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他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綱的最初草案，雖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這個時候，只是籌備組織，還沒有正式成立，預備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後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然後于第二年夏天，開各地代表大會，正

式成立。」（見周佛海所著往矣集）

陳公博是民國十年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廣州代表，他說：「民國十年七月初旬……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轉上海……在上海還聽見一件戴季陶先生的軼事。季陶和仲甫約定共同發起共產黨，到了成立之前一日，季陶來了一封信，說他和國民黨關係太深的確不能參加共產黨的組織，不過他是同情共產黨的；他正在覓辦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贏餘，來幫忙共產黨的黨費。」（見陳公博所著寒風集）

### 張國燾包惠僧追記

張國燾于事後追述中共籌組時的經過，說：「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我由北京乘火車赴天津……不久我到達上海，我去訪問那時還在法租界霞飛路海陽里二號的陳獨秀先生……陳先生向我表示，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他們都一致表示贊成……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和成立上海小組的初步商談，是在我到達上海以前就已開始進行，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小組——上海小組——的正式組成是在我離開上海以後的事，約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陳先生所說，中共最初發起人，也即是上海小組的組成人員，是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統等七人，戴季陶因爲國民黨籍的關係，沒有正式加入組織……後來陳獨秀曾和我談到中共第一小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的小組

上，每個參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則表示他與孫中山先生的深切關係，不能成爲一個黨員，并因此哭了一場。因爲他內心很相信共產主義，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願以償。」

包惠僧也在事後追述以前中共籌組的情形，說：「五四運動的怒潮，震動了全世界，第三國際重視這一事件，約在一九一九年的冬天至一九二〇年的春天之間，派魏金斯基來中國了解中國的政治情況……他由鮑立維的介紹，會見了李大劍同志……又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和時事新報的負責人張東蓀……戴季陶、沈玄廬都是老國民黨員，李漢俊是剛從日本帝大畢業回國，被戴季陶吸收到星期評論寫文章的。魏金斯基與他們談了幾次，他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建立一個新中國革命同盟，并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起來組織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社會黨。可是經過相當時間的醞釀，把這個意見正式提出來，首先就嚇倒了張東蓀，退出了這個運動。戴季陶最初還表示同意，但看到黨綱草案中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時，戴季陶也借口他不能同國民黨斷絕關係，申請退出了這一運動。」

### 逐一駁正陳周張包

從上列這幾段文字的表面看來，好像中共的籌備發起，戴先生曾一度參加，後又退出。但仔細考量一下，却又大有問題了：



第一，他們四人所說的話，大同小異，顯係同一來源，可能都是從陳獨秀散播出來的謠言。他們雖都提到戴先生，可是沒有一人說，曾親見戴先生參加他們的任何會議，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能說其中沒有疑問嗎？

第二，周陳兩人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是在他們脫離共產黨若干年之後，固然沒有替共產黨隱瞞或迴護的必要，但是共產黨他們雖然脫離了，而陳獨秀對他們講的話，還沒有從他們的腦子裏脫離，他們寫回憶的時候，自然會照樣吐露出來，何況那時他們都已做了漢奸，毀謗國民政府的大員，也是符合漢奸的利益。

第三，張國燾所說陳獨秀告訴他的這些話，雖對戴先生極盡污蔑之能事，但戴先生的言論思想，昭昭在人耳目，他會說他內心很相信共產主義嗎？他會因為不能加入共產黨，而大哭一場嗎？這些令人冷齒的謊言，誰會相信！至于包惠僧說，戴先生因為看到共產黨的黨綱草案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就借口他不能同國民黨斷絕關係，申請退出這一運動，更是白日做梦，越說越可笑了！試問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後來不都加入了國民黨嗎？而且陳獨秀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周恩來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和東江行政專員，不都是官吏嗎？戴先生如果願意加入共產黨，又何必不能加入國民黨，和做國民政府的官呢？再則，周佛海不是說中共的黨綱草案是戴先生起草的嗎？那末，這黨綱草案的內容，戴先生就應早已知道了，又何至于如包惠僧所

說，看見黨綱草案，才借口改變主意，而退出這一運動呢？這不是互相矛盾嗎？所以，謠言終歸是謠言，謠言造多了，反而會露出馬腳來的。

第四，這一點更重要，陳公博文內，沒有把中共的發起籌備會和正式成立會分開，說得含糊，使人莫名其妙，但他提到戴先生親辦交易所的話。戴先生的交易所到民國十年就結束了，可見他所說戴先生來信拒絕參加的，是民國九年中共的發起籌備會。至于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三人更明白說出戴先生沒有參加（或稱退出）民國九年中共的發起籌備會。周佛海雖然在說邵力子沈玄廬加入的時候，把戴先生也帶上一筆，說：「戴季陶也是一個」，但又立即轉過頭來，說他沒有加入，并選特別申明「這個時候，只有籌備組織，還沒有正式成立、預備……」第二年夏天，開各地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凡此均可見戴先生沒有參加中共的發起籌備，是鐵的事實」。

照上面的情形看來，戴先生拒絕參加的，正是中共未正式成立以前的發起籌備會，還能說他曾參加發起中國共產黨嗎？比如，一個團體，最初邀請許多人參加發起，到了開發起籌備會的時候，有人聲明拒絕參加，還能說他是發起人嗎？還能說他曾參加發起嗎？所以，我的結論，是戴先生不但沒有加入共產黨，而且不曾參加共產黨的發起，更不是共產黨的發起人。

### 中共前身偽造歷史

談到中國共產黨的前身問題，各說不一，據

沈雲龍著「中國共產黨之來源」說：「中國共產黨的前身是民國九年五月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和同年七月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後蛻化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而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前身則淵源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中國共產黨之透視」及胡秋原著「俄帝侵華史綱」，國立編譯館出版「俄帝侵略中國史」，都有相似的記載。此外謝彬著「民國政黨史」，也說有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之組織，但與社會主義青年團意見不合，積不相能。此雖另一說法，然先有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有中國共產黨，仍為公認的事實，也和我所說相同。如果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前，或其同時，還有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或社會主義研究會，顧名思義，也不過是屬於研究性質的團體，戴先生曾否參加，不得而知，就令參加了，也是為了研究，而不能說是參加發起共產黨。至于所謂「中共的官方史料」說，中共成立之前，先組成共產黨小組，這是後來共產黨因要否定以前陳獨秀組織的史跡，而改編出來的，不足取信。（詳見沈著中國共產黨之來源。）王健民說：「所有世界上的共產黨，幾乎都是善于毀滅或歪曲歷史的。他們以為攫取了政權，也就攫取了歷史，他們以為改造歷史，同他們改造社會，改造人性一樣，可以使其合于自己專政的要求」（見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序），這話一點也不錯！在中共未組成以前的所謂共產黨小組，既是他們事後偽造出來的，當然更談不上戴先生的加入，何況他們也說戴先生沒有加入呢？

## 社會主義主張各異

我國于五四運動之後，爆發了社會革命的高潮，大家紛紛研究社會主義，研究的團體也如雨后春筍的成立。不過那時的社會主義，派別很多，主張各異，然大都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為主旨，只是方法不同罷了。國父孫中山先生遠在民國建立之時，就已提倡社會革命，先後發表言論多次，他說中國革命，除實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之外，還要實行民生主義。并且解釋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不過民生主義是和平的，是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方法，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也可以說是他獨創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詳見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輯之國父全集，國防研究院印行之國父全書，及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楊幼炯著中國政黨史），可見社會主義并不是共產黨的專利品，那時研究社會主義的團體也不一定是中國共產黨的前身，不過中共在未組成以前，寄生在這些團體裏面求發展而已。

## 陳獨秀的攀污藉口

戴季陶先生是國父的忠實信徒，當時也很熱心研究社會主義，并會翻譯日文「馬克斯資本論解釋」，發表于建設雜誌。陳獨秀在未組成中共以前，還是一個學人身份，因為大家研究的關係，很自然的會和戴先生交往。民國九年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最初也是以研究社會主義為宗旨，陳獨秀也有向他徵求意見的可能。也許這就是後來成為共產黨攀污他的借口。其實那時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純粹是研究性質，研究的範圍，也不限于馬列主義，所以參加的人相當多，信仰也不

一致。我和幾個同學，也曾參加，後因主張不同，并發現陳獨秀有將它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意圖，我們就退出了。據「中國共產黨之透視」說到了民國十年，這個社會青年團也解散了。幾個月以後，陳獨秀他們又另外組織起來，隨後又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就成為共產黨的預備隊，和第三國際少年共產黨的中國支部，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

總之戴先生對社會主義，乃至對共產主義有研究，是事實，陳獨秀拉攏他，要他參加發起共產黨，是事實，但他沒有參加發起也是事實。

## 共黨要打反共巨人

共產黨是以宣傳起家的，宣傳是他們最大的武器。如果有人駁倒他們的宣傳，就等于在戰場上繳了他們的械。戴先生正是這麼一個人。他有豐富的學識，有卓越的才華，又有精密而生動的文筆。他充份瞭解共產主義的謬誤所在，所以寫起文章來最能打中共產黨的要害。共產黨首要毀滅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毀滅人性，然後才能把邪惡的馬列思想移植到中國來，而戴先生偏要做衛道之士，他雖是本黨的前進份子之一，但他深知關於天地，必有與立，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即所以否定中國的存在，所以他要保持中國傳統文化，要維護人性的尊嚴，和共產黨的主張，正好背道而馳。最初共產黨是千方百計的，想拉攏他，試

看周陳張包四人所說陳獨秀因為戴先生拒絕和他們合流，而遺憾無窮的樣子，即情見乎詞。後知戴先生終必成為他們的死敵，又怕他的言論文章足以致共產黨的致命，所以就先發制人，發動謠

言攻勢，一聲令下，眾口如雷，謠言四飛，說戴先生曾參加發起共黨，後又退出，使他蒙上一層陰影，而離開他和本黨同志的關係。迨至戴先生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反共名著出版，予本黨內外反共人士，以理論的根據，而給共產黨致命的打擊，共產黨更大起恐慌，于痛恨入骨之際，仍由陳獨秀低首下心，寫了一封長信向他解釋（詳見中國共產黨史稿）可是戴先生義無返顧，反共到底，從此更和共產黨勢不兩立了。

## 戴季陶為共黨死敵

固然，在當時贊成社會革命，而又反對共產主義的，并不祇戴先生一人，為什麼共產黨獨始終纏着他，而不放過他呢？例如張東蓀也是和戴先生一樣，共黨發起籌備的時候，曾要他參加，他拒絕了，也就若無其事，為什麼共產黨又能放過他呢？再早一點，胡適之蔡元培吳稚暉諸先生和陳獨秀也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後來分手了，共產黨為什麼也能放過他們，而不造謠狂吠呢？此或由于共產黨不願樹敵太多，而戴先生一馬當先，澈底反共，還是主要原因，他們既恨他拒絕參加發起共黨于前，又怕他反對共產主義于後，所以才成為終身仇敵。

共產黨對于仇敵是不會放鬆的，他們不斷以明槍暗箭向戴先生圍攻，滿擬可以把他打倒，不料公道自在人心，他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共產黨的荒謬理論被他擊潰了，并且打得頭破血流，創鉅痛深（詳見中國共產黨之透視及中國共產黨史稿）使中國的赤禍展緩了若干年。倘若不是俄



帝在背後撐他們的腰，也許他們早已消滅了。這是後話，不過戴先生也因此負了暗傷，至今還沒有全愈——就是共產黨造的謠言還沒有完全平息。

### 當心嘴筆被人利用

造謠中傷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他們善于利用社會羣衆的盲從心理，他們認為一件事只要多說幾次，或者不斷的說，好的可以說成壞的，假的可以說成真的。他們沒有公是非，一切事物都是以黨的利益來衡量。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他們可以改編，明明白白的共產黨，可以說成土地改革者，去欺騙美國人，還有什麼事不能做！他們造謠中傷的事例不知多少，這是他們統戰的一面。試想想大陸撤退之前，不是謠言滿天飛嗎？倘若當時大家不相信他們的謠言，大陸何至淪陷！

現代的傳播事業，非常發展，廣播電視，固無待言，就以印刷而論，速度也快得驚人，以前要印一部書，窮年累月，才能出版，現在一本幾十萬字的書，不到幾天功夫，就可問世，再與廣播電視相互流通，傳播效率之大，更無可限量。所以我們開口說話，或動筆作文，都要特別謹慎，否則一有疏誤，遺害無窮。可是有些多產作家，常不假思索，東抄抄，西抄抄，只顧稿費上腰，或博取著作虛名，不惜粗製濫造，不管後果如何。其尤甚者專為迎合讀者的好奇心理，以傳播奇談怪論為能事，共產黨正好利用這種機會，或明或暗，把毒素滲透進來，所以現在市面上的書刊仍有不少是有毒素的。

共產黨不但自己會宣傳，而且還會利用人家

的嘴巴和筆桿替他們宣傳。前些年美國的青年子弟正在越南對共產黨作殊死戰，而美國國內的反戰份子，則大聲疾呼，遊行示威，來扯他們的後腿，我國在抗日和戡亂的期間，辦了許多免費學校，來收容失學青年，後來他們反而唱出反共餓

黨利用的明證。談到這裏，我要呼籲我國的出版界和著作家，來一個自清運動，仔細檢查所出的書刊有無毒素存在，我更希望以後我們大家說話也好，作文也好，而尤其引用人家的言論時，更要特別小心，勿被共黨利用，而為我國文化界留一塊乾淨園地。

## 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一)服務事項：1.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代訂雜誌。3.代印文件。4.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EIDOSCOPE MONTHLY

7-2 SHIN SHENG'S. RD. SECT.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訂價台幣肆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史學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可作大專文史教科參考書及一般閱讀之用。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